



從綠地類型看近代 澳門的城市綠化建設

郭聲波* 許 燕**

城市綠化是近代澳門走上城市現代化道路的一項重要內容。近代澳葡當局較為重視城市的綠化建設與管理，特別是19世紀末的20年間的綠化成果基本上奠定了現今澳門的城市生態基礎。本文通過探討近代澳門城市綠地類型，從一個側面揭示葡澳當局對近代澳門的綠化建設思路。

前言

城市綠化建設一般是指栽種植物以改善城市環境的市政活動，通過植樹造林、種草種花，把一定的地面或者空間覆蓋或者是裝點起來，從而使城市生態系統具有還原功能，達到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環境的目的。

由於澳門地理環境與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城市綠化的發展進程並非是一蹴而就的。1849年以來，澳葡當局對澳門的公共環境進行過規劃，城市綠化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曾在澳門大力開展。特別是19世紀80年代葡萄牙人奪取了澳門的管治權之後，在面臨澳門發展抉擇時，他們也強烈意識到澳門城市的規劃、建設與管理刻不容緩，由此制定了澳門城市綠化建設的規模與模式。但關於近代澳門城市綠化問題的研究成果不多，目前僅見有 Nogueira 的《澳門380種植物種類的名稱及說明》（*Catálogo descritivo de 380 espécies botânicas da colónia de Macau*, 1933年），[葡]埃斯塔希奧的〈澳門綠化區的發展及其重要性

以及本澳植物的來源〉（載澳門《文化雜誌》第36-37期，1998年），[葡]阿豐索的〈澳門的綠色革命（19世紀80年代）〉（載澳門《文化雜誌》第36-37期，1998年），陳偉明等〈近代澳門城市公共環境規劃與管理(1840-1911)〉（載澳門《文化雜誌》第81期，2011年）等數種論著，它們回溯了19世紀80年代澳門市政中的綠化規劃如綠化政策、綠化標準，以及嘉思欄、燒灰爐、Mitra、白鴿巢、二龍喉等公園的綠化事例，介紹了早期綠化的樹種引進及綠化區的管理和維護工作，並從公共環境的角度論述了綠化規劃與管理問題。本文則準備對近代澳門城市綠化地類型進行探討，以期能推進近代澳門城市綠化規劃、建設與管理的研究。

澳門植被以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為主，儘管受面積所限，植被面積較小，但由喬木、小喬木、灌木、藤本、草本植物組成的立體景觀較為顯著；同時由於澳門城市發展的特殊歷程，城市綠化地類型與其它城市有所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發的《城市綠化條例》將城市綠化地分為公共綠地、居住區綠地、單位附屬綠地、防

* 郭聲波，歷史學博士，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歷史地理學。

** 許 燕，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



〔圖1〕東望洋山南麓的黎登別墅（約1890年）

採自利冠棉等《19-20世紀明信片中的澳門》，澳門歷史教育學會，2008年。



〔圖2〕二龍喉公園中的澳督夏宮（1950年）

採自利冠棉等《19-20世紀明信片中的澳門》，澳門歷史教育學會，2008年。



[圖3] 施力華·文第士住宅“知春邨”的園林風光
採自利冠棉等《19-20世紀明信片中的澳門》，澳門歷史教育學會，2008年。

護林綠地、生產綠地、風景林地、幹道綠化等；國家標準《城市用地分類與建設用地標準》則用“二類法”，即公共綠地和生產防護綠地。這兩種分類方法都未被澳門採用，澳門民政總署根據澳門城市管理特點，把綠化地按功能分為花園及公園、道路綠地、苗圃、墳場、規劃區、重植林及其它等組成部分。本文則根據澳門的歷史文化特點，將近代澳門的城市綠化地(簡稱“綠地”)分為私宅花園、公共花園、道路綠地、苗圃、墳場、宗教設施綠地、軍事設施綠地等七大類型。澳門的荒山不多也不大，最大的就是東望洋山，而東望洋山在近代已成為澳人公眾多遊覽勝地，因此本文不再將其單獨列為一種類型，而是將其融入公共花園中討論。

私宅花園

私人宅院綠地屬於非公共綠地，多以花園式別墅和別墅周邊綠地的形式出現，這些綠地不僅

本身是城市規劃與建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綠化節點，而且對周邊的公共環境也有改善作用。因此1883年澳葡當局規定：“在塔石街以北開闢新街道時，各個住宅前面必須帶小花園。”⁽¹⁾這項規定得到了居民的積極回應：“在離市中心不遠的地區，那些最富有的居民，不管是葡萄牙人還是其他外國人，都弄一小塊土地來為自己建別墅，於是在那一帶紛紛出現了名叫‘Chácara’的莊園式別墅，其中一些後來很有名氣，比如主教別墅，馬麗亞菲力浦別墅、修女別墅、子爵夫人別墅，聖若瑟或馬諾柴別墅，以及雷坦別墅等。”⁽²⁾圖1-3即顯示了部分近代西式別墅、花園的綠化景象。

其實中式宅院的花園也早已出現。1870年(同治九年)，華商盧九將東望洋山之西的龍田村農田菜地購為私家花園。1904年由其子盧廉若聘請香山人劉吉六設計，按蘇州名園風格重新構築，1925年建成，號“娛園”，它是澳門唯一具有蘇州園林情調的園林，園中有修篁垂

柳、紅梅綠荷⁽³⁾，面積達25,000平方米，為當時澳門半島面積的1/16。

1882年前，又有黃允其人在東望洋山北麓建有自己的花園。⁽⁴⁾

香港富商唐麗泉於清末旅居澳門，承購望廈村面積廣袤之田地，後營建園林，人稱唐家花園、唐園。當時整個花園內綠樹成蔭，繁花夾徑、美不勝收。⁽⁵⁾

20世紀20年代，澳門紳士張仲球皈依佛門，因名居所曰因樹園。汪兆鏞1938年秋移居張園時有詩贊曰：“卜地二龍泉，結園三畝寬。百年喬木在，昕夕相盤桓。”⁽⁶⁾張園舊址在東望洋山之北，士多烏拜斯大馬路和雅廉訪大街交界處，後門靠文第士街。⁽⁷⁾始建時間大概建成於1912年後，與唐麗泉園宅（唐園）、盧廉若花園（盧園）並稱澳門“三大名園”（圖4）。



〔圖4〕1927年澳門地圖中的“三大名園”（採自《文化雜誌》第36-37期，1998年）

何東花園的前身是亞美打神父的園林別墅，曾經栽花植樹，後為澳督官邸，人稱“兵頭花園”⁽⁸⁾，1930年因附近火藥庫爆炸而毀，港人何東購其一塊地皮辟為花園，即今二龍喉公園前身。⁽⁹⁾

私宅花園在進入20世紀特別是二戰之後，大多數易其主，最終消失（如望洋山的別墅、黃園、唐園、張園）或改為公共花園（如盧園、何園）。

公共花園（公園）

澳門公園是融合了中式與葡式文化的產物，它們對於澳門的植樹綠化、建造苗圃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葡國農林專家埃斯塔希奧說過：“我們姑且不談公園究竟有沒有歷史價值，但它肯定是城市發展和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為社

會各階層的市民提供聚會場所，從而扮演平衡社會各階層間差別的角色。”⁽¹⁰⁾可見這些公共花園自其修建之初，就對澳門的整體城規劃與建設以及市民的生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澳門最早的公共花園當屬19世紀初修建的白鴿巢公園（Jardim de Luís de Camões）。它本是葡國富商馬葵士的私宅花園，1787年主人逝世後不久，澳葡當局承購其地，後來幾經開闢，建為公園。1849年魏源來澳時，留有〈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一詩，序云：“澳門自明中葉為西洋市埠，園亭樓閣，如遊海外，怪石古木，珍禽上下，多海外種。”即所謂“怪石磊磊木千章，園與海濤隔一牆”。徐新認為這是描寫當時白鴿巢園林的情形。⁽¹¹⁾直到清末光緒庚子年間，猶有“白鴿巢高萬木蒼，沙梨兜湧水雲涼”之詠。⁽¹²⁾

這些高大的喬木，主要就是馬葵士當年從南洋引種的菠蘿蜜（*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桑科）和鳳凰樹（*Delonix regia*. 豆科）。⁽¹³⁾

19世紀60年代修建的南灣花園（Jardim de S. Francisco），今名嘉思欄花園。埃斯塔希奧認為：“亞馬喇總督在其任職期間對修建南灣花園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該花園是澳門的第一個花園，也可能是東方的第一個公園，它當時的形狀是長方形的，同現在的大不一樣。”⁽¹⁴⁾

南灣花園最初是從海濱到山上連成一片，從1900年的照片可見，在濱海大道（今南灣大馬路）外側，高大齊整的小葉榕（*Ficus microcarpa*. 桑科）應該已有數十年歷史（圖5）⁽¹⁵⁾；在靠山的一個通道（今家辣堂街）兩側，新種植的樹木已然成蔭（圖6），頗具歐陸風情。

公園修建之後得到了不斷的維護與重建，如在1882年，“公園深處的水簾已經修復，從而贏得了新貌。被白蟻蟻毀壞的看園人的木頭房頂也得以修繕。公園四周的圍欄也已經重建。（……）由於嘉思欄公園原來沒有大樹，祇有一些花草和灌木，因此特別注重樹木的栽培。而且也希望把

現在祇有破屋的地塊改建為嘉思欄公園的前地，這樣便可把那裡現存的兩棵樹冠龐大而漂亮的大樹歸併於公園”。⁽¹⁶⁾

19世紀後期開闢的公園還有1898年在東望洋山以西所建之華士古達伽馬公園（Jardim de Vasco da Gama），在馬交石一帶所建之螺絲山公園（Jardim da Montanha）⁽¹⁷⁾，位於西望洋山北麓的南環公園（Jardim do Chunambeiro）等。光緒末年羅慧卿〈遊南環公園〉詩曰：“園構南環近海偏，茂林如障草如氈。”1925年有詩詠螺絲山植被：“雜樹暗疑三里霧，亂流曲寫九回腸。”⁽¹⁸⁾華士古達伽馬公園又名荷蘭園，當年也是棕櫚成行，綠草如茵，與得勝花園連成一片，稱為“新花園”。⁽¹⁹⁾可見在19世紀末期全市大規模的植樹造林運動中，公園的發展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視。正如科斯塔所說：“在那個時代，人們沒有論及生態學，但他們以不尋常的自覺意識提倡植樹種灌木，便本島逐漸有了綠色區域，綠化了東望洋山，建立了得勝街、嘉思欄（即南灣）、二龍喉（即兵頭）、螺絲山、燒灰爐街（即南環）、白鴿巢、盧九等處的公園。”⁽²⁰⁾



〔圖5〕南灣花園（約1900年）（採自利冠棉等《19-20世紀明信片中的澳門》，澳門歷史教育學會，2008年。）



[圖6] 南灣花園 (約1920年) (採自利冠棉等《19-20世紀明信片中的澳門》，澳門歷史教育學會，2008年。)

然而進入20世紀之後，隨着填海擴路和城市用地規模的擴大，公園逐漸減少、萎縮。如南灣花園1932年因填海擴路而拆去了花園的圍欄，南環公園也逐漸被豪宅官邸所佔，退出了歷史的舞臺。螺絲山公園日漸荒蕪，新花園則祇餘下一個小小的象徵性的華士古達伽馬公園。二戰以後，澳葡當局才又開闢了一些新公園作為補償，此是後話不提。

東望洋山是澳門最高的山，海拔90多米，滿山樹木，蒼翠常青，像一顆綠寶石鑲嵌在半島東部。誰會想到它原是光禿禿的山崗？百年前遍植馬尾松（*Pinus massoniana*，松科）後，生長鬱鬱蔥蔥，改變了原來醜陋的外貌，被稱為“松山”、“萬松山”⁽²¹⁾，清人詩中曾贊為“十里松濤”、“長松萬影”⁽²²⁾。根據葡國農業專家坦克雷多·利貝羅的報告，具體載種時間是在1883-1884年間。⁽²³⁾

道路綠地

近代澳門除了花園與公園之外，與市民最息息相關的要數道路綠化地帶了。道路綠化通常位於馬路、人行道上，也是美化、綠化、淨化城市的重要手段。澳門的馬路一般規劃的比較狹窄，因此道路綠地的空間是十分有限的，可容納的植物種類不多，數量也都不大。1877年時，澳葡當局已開始實行道路綠化建設：“兩年時間內成功引種了大量今天仍被人們倍加欣賞的榕樹。該樹樹冠頗大，被稱為‘塔樹’。據統計在塘巷和青雲里一帶種植22棵，在南灣街種植7棵，在嘉思欄大馬路種植27棵，在望廈街一帶種植86棵，在亞婆井街和媽閣街一帶種植13棵。”⁽²⁴⁾

近代澳門道路綠化建設比較突出的有南灣街、燒灰爐街、民國大馬路、水坑尾街、關閘馬路、士多鳥拜斯大馬路、華士古達伽馬新路、西灣街、沙欄仔街等馬路。



〔圖7〕華士古達伽馬路綠樹成蔭 (約1900年)

採自利冠棉等《19-20世紀明信片中的澳門》，澳門歷史教育學會，2008年。

南灣街建成於1863年，是澳門最繁盛的街道之一，長期以來都是政府機關的重要地域，從1877年到1890年，用了十多年時間，才完成了長約1公里的濱海一側的行道樹種植 (圖7)，可見澳葡當局的對街道綠化的建設還是比較艱難的。

1895年，東望洋山西側的華士古達伽馬大馬路竣工，“這個路段當時進行了很好的綠化”⁽²⁵⁾，由 (圖8) 可見，道路的綠化情況是很不錯的。儘管這條街道二戰後被何東中葡小學、市立游泳池及伯多祿小學等佔據而消失⁽²⁶⁾，但仍保留了一個“華士古達伽馬花園”，依稀可見當日的綠化風貌。

沙欄仔街一帶，1882年植有不少縱橫成行的柳樹 (*Salix babylonica*, 楊柳科)，由葡國工程師布里托主持這項工程。⁽²⁷⁾

西灣街是1910年才建成的，沿海堤岸一側也種植了榕樹。有二十年代的詩章為證：“今夜勝遊宜記取，綠榕蔭裡話悲歡。”“幸有綠榕張翠蓋，不無人作水中鮑。”⁽²⁸⁾ 而民國大馬路的綠化樹則別出心裁地選擇了柚 (*Citrus maxima*, 芸香科)⁽²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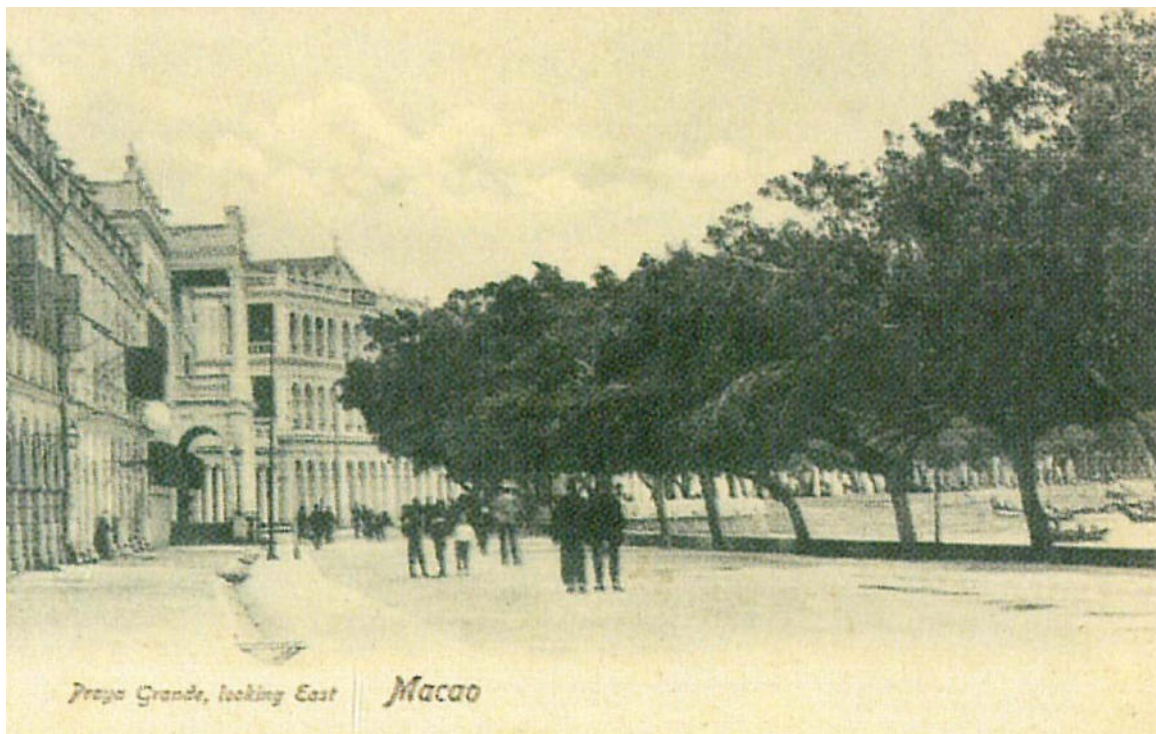
科斯塔在《澳門建築史》中提到：氹仔島在1879年新建街市，並在路旁種植樹木。由此可知，離島早期的人工綠地也是行道樹。

苗圃

苗圃作為城市綠地系統的一部分，既是園林綠化苗木的生產場所，承擔着園林綠化苗木的繁殖和培育，為城市園林綠化提供綠化用苗，同時也是城市綠地系統的後花園，具有綠化功能。

近代澳門的苗圃主要分佈在自然條件相對較為優越的氹仔島、路環島和半島的兵頭花園。

1882年，氹仔和路環離島市政廳廳長談到樹苗培育問題時說：“經聽取此方面有學識和經驗之人士的意見，他們對更適宜苗圃栽培的土壤區域作了推薦，據此我已劃定了用作苗圃的區域。在氹仔村，已選址兩處，面積不大，但土層深厚，且能遮擋從北面和東面刮來的大風。橫琴島為我們提供了大片土地，但我還沒有拿定主意，因為這項重要工程暫時還無需如此龐大。該島上官員表示願意與我合作，此舉尤為重要，因為他是負責這項工作和檢查事宜的重要人物。路環島有好幾處適宜苗圃栽培之地，並都位於天后廟附近石排灣山谷和九澳山坡。在這諸多選中地區，祇有氹仔和路環村的地區每年需要撥出少量款項用於看管和維護。”⁽³⁰⁾



[圖8] 南灣街的行道樹(約1890年) (採自林發欽《澳門街道的故事》，澳門培道中學歷史學會，2005年。)

半島上則將二龍喉的兵頭花園作為培養苗圃的最佳選擇。一份〈關於1883年6月至1884年澳門綠化的報告〉談道：“苗圃的建設速度相當快速。苗圃的位置，早已選定在二龍喉公園(按此處指二龍喉的兵頭花園，當譯為“二龍喉的花園”，“二龍喉公園”是二戰後才建立的)裡面，南起公園的圍牆，北至靠近大馬路一旁的水泉地段。那是一塊高低不平的斜坡地，必須為平整土地和建成所設計苗圃的地形而進行艱辛的工作。苗圃被分為插枝培植和播種培植兩個區域，兩個區域中間由長達40米、周邊栽種臭桐和銀樺以及其它種類的樹木的平地隔開，以增加苗圃的生機，並使它們成為令人感到愉悅的地方。”⁽³¹⁾“苗圃就位於這座法蘭西式的花園旁邊。正是從那裡培育出的樹苗今天已在澳門的山坡上生根落戶。”⁽³²⁾

除了對苗圃場所有所選擇外，對苗圃內的樹種也有選擇性的培育。1883年3月30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載：“除了一般的樹木以外，在澳門栽種松樹更加適宜，不僅在那些去年栽種但後

來被華人毀了的山頭及山坡上，還應在其它便於他們生長發育的地點栽種。同樣應該為這些種類的樹木和桉樹建造苗圃。選作此用的地區最好的是氹仔、橫琴或路環某個島嶼的地段，然後從那裡直接移植到澳門半島。特別是桉樹，這種漂亮的樹木除了有經濟價值，還具有生長快、木質堅硬的特點。”

這些苗圃很快就發揮了作用：“從二龍喉苗圃裡移出並經過精心處理的樹苗被移植於本市各處，特別是栽種在二龍喉東側山坡上的樹苗今天生長得格外茂盛。這樣大面積的植樹造林在五、六年內將為城市的清潔衛生和美觀帶來很大的效益。那些過去曾經令遊客見到心酸的光禿禿、到處遍佈花崗岩和其它岩石的山頭，那些看上去便讓人想到開山放炮的山頭，那些看上去令人更認為是開採建築房屋的石料而並非用做栽培任何樹木的山頭，將來卻會變成鬱鬱蔥蔥的茂密叢林。那時給來這裡觀光的外國遊客將留下無限美好的印象。”⁽³³⁾

墳場綠地

近代澳門建有許多或大或小的墳場，如聖保祿墳場、白鴿巢前地基督教墳場、聖味基墳場（舊西洋墳場）、望廈墳場（新西洋墳場）、白頭路印度教徒墳場、摩囉園回教墳場等，它們在近代澳門城市規劃與建設中，也是宣導植樹的重要場所。

澳葡當局對墳場綠化是比較重視的。1880年出臺規定：“照得西洋墳近日所植花木，現查得有往來之輩擅行扳摘此花。茲特奉公會命，自示之後，如有不遵規矩擅行扳摘者，即按咁嘛喇告示總匯冊第二款例，每人罰銀二大元。今欲各人周知，是以在華政衙門將示譯出華字張貼，俾各咸知。”⁽³⁴⁾ 這樣，西洋墳場的綠化成果才得以保護。

摩囉園回教墳場建於1774年，佔地約3,500平方米，“花木遍地，深溪蓊蔚”⁽³⁵⁾。白鴿巢前的基督教墳場，現今仍有許多高大的龍眼樹（*Dimocarpus longan*. 無患子科）遮天蔽日，樹齡當在百年以上（圖9）。

白頭墳場位於松山卓公亭側，興建於1829年，面積數千平方米，樹木茂盛，其中以雞蛋花樹（*Plumeria rubra Acutifolia*. 夾竹桃科）為多，故曾被稱做白頭花園。⁽³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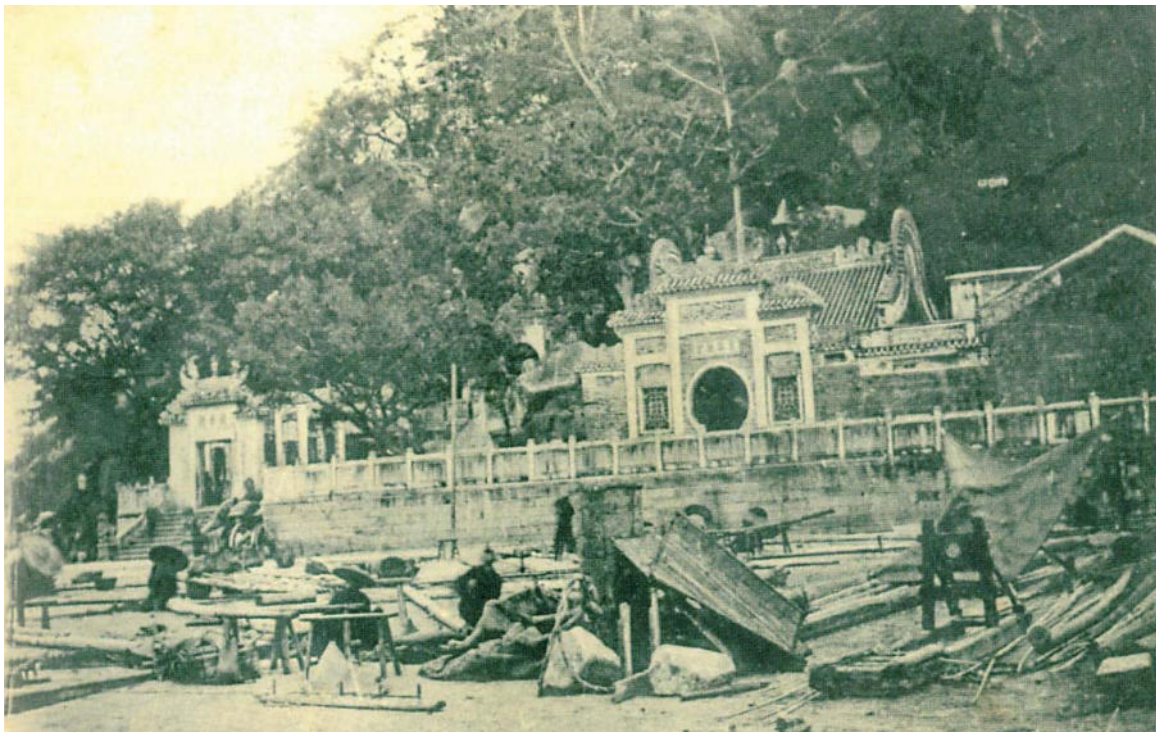
聖味基墳場以今日看來，很難見到高大喬木，低矮花草為主要綠化手段，我們認為可能與墳墓數量日漸增加難以容納過多樹木有關，在興建墳場之始，料想也應該植有許多樹木吧。

宗教設施綠地

澳門歷史悠久，由於其特殊的歷史發展背景，宗教設施較多，中式寺觀廟宇和西式教堂修院遍佈各區，雖然風格迥異，但在種草植樹方面卻都有共同的追求。因此規模較大的寺廟、教堂，或者是寺廟與教堂所依傍的山坡，一般都有大片的綠地。如1870年澳門政府衛生司承認：“本市樹木稀少，大部分在修道院和一些私人住宅周圍。有些樹木是賈多素和亞馬留任總督期間種植的，其中有的已經枯死，有的已被砍伐。”⁽³⁷⁾



[圖9] 基督教墳場的老樹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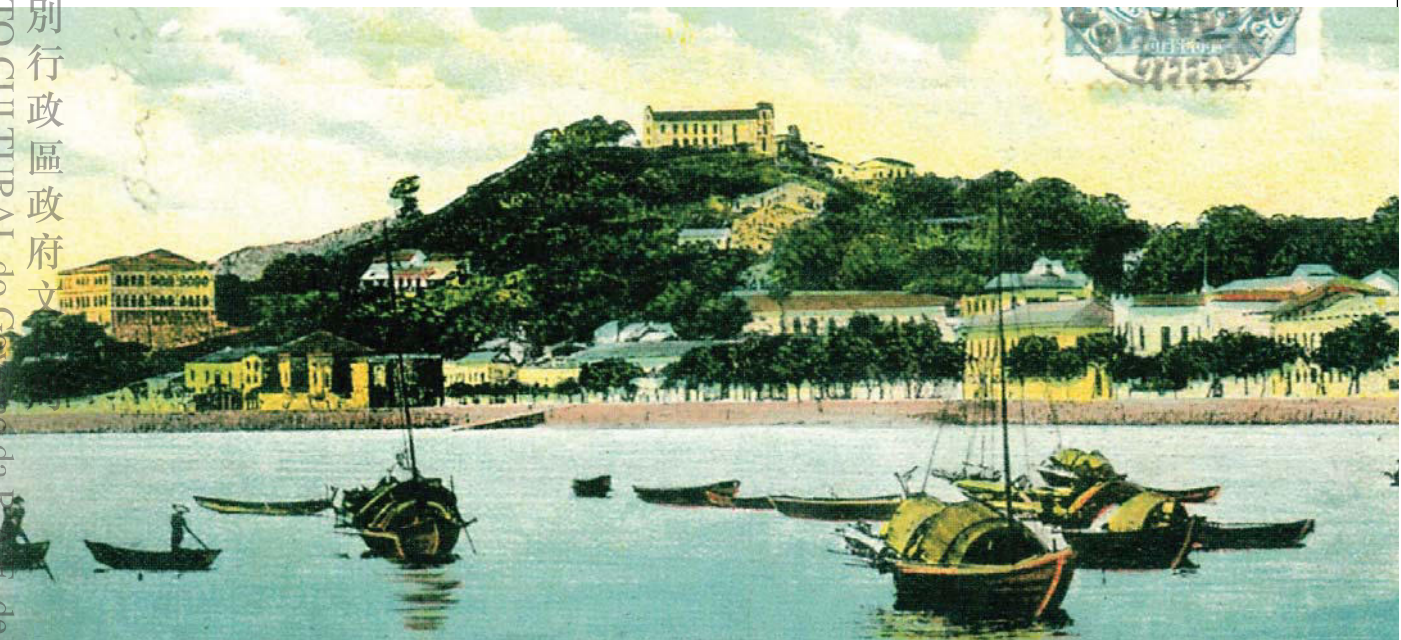
△ [圖10] 林木蓊蔚的媽閣廟 (約1890年)
採自利冠棉等《19-20世紀明信片中的澳門》



◁ [圖11] 聖若瑟修院門內的榕樹
採自《喬治·錢納利——19世紀的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7年。

在中式寺觀廟宇中，以建在西望洋山麓的媽祖廟植被最盛 (如圖10)。歷來不乏文字、圖形描繪，今隨手拾擷清道光至二戰期間詩文若干，以見當日樹木蔥籠之勝概。如張玉堂〈謁媽閣廟〉詩：“玉(榕)樹逼巖翠，蓬峰浮海青。苔侵三徑石，竹繞半山亭。”〈遊澳門海覺寺〉詩：“蓮花湧座承甘露，榕樹蟠崖蔭玉臺。”李龍躍〈娘媽閣〉詩：“叢林軟檻碧，怪石插天青。”釋暢瀾〈題媽祖閣石壁〉：“萬木重張綠，群山齊送青。”⁽³⁸⁾ 黃棣華〈遊澳門天后廟〉詩：“路曲盤旋緣石蹬，林深隱約煥香煙。”鄭哲園〈題媽閣〉詩：“高低臺閣樹邊樹，明滅斜陽山外山。”⁽³⁹⁾

普濟禪院的竹林也比較有名。張其淦〈古寺訪僧〉有云：“古寺秋色濃，黃葉積階下。……竹徑聲聲寂，猛風撼楸檟。”據章文欽考證，此古寺即普濟禪院。⁽⁴⁰⁾



[圖12] 西望洋山頂聖堂猶如浮在綠島上(約1890年)
採自林發欽《澳門街道的故事》，澳門培道中學歷史學會，2005年。

連勝馬路之竹林寺，1911年(宣統三年)建，本為祥雲仙院(道觀)，後改佛刹，其中遍植紫綠之竹，故又名紫竹林。1939年鄭哲園有〈訪羅寶山居士於竹林寺即贈〉詩：“蓮社豈妨開酒甕，竹林參差掛詩瓢。”⁽⁴¹⁾可證。

在西式教堂修院中，比較有名的是位於崗頂的聖若瑟修院聖堂，從一幅英國畫家錢納利繪於19世紀中葉的聖若瑟修院正門圖，即可窺見當時院中大葉榕(Ficus Lacor. 桑科)生長的繁茂情況，正是“綠色滿堂關不住，數枝新葉出牆來”(圖11)。以其樹形高大，時稱塔樹、聖若瑟樹。⁽⁴²⁾

在西望洋山頂，還有一座主教山聖堂，又稱海崖聖母小堂、卑拿聖堂、西望洋聖母堂，始建於1622年，1935年與主教私邸一同重建為現時規模，遠遠望去，林木蔥籠，猶如一座浮在海中的綠島(圖12)。

軍事設施綠化地

炮臺、城牆與關閘綠地是基於近代澳門特殊

的歷史條件背景形成的軍事設施綠地類型。在19世紀40年代葡人佔領了澳門半島北部之後，澳門半島的炮臺、城牆與關閘的作用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

炮臺一般都建於地理位置險要的地方，對於澳門半島來說，要麼據山掌控高點，要麼據海掌控港口，最佳的則為背靠高山，面臨大海，易守難攻。因此，不論是山地還是沿海港灣，為便於隱蔽，澳門炮臺都與茂密的森林植被分不開。如圖13，就是19世紀畫家筆下的東、西望洋山上的炮臺綠地。三巴炮臺與老城牆是連在一起的，有一幅攝於1905年的老照片，真實地反映了該處的植被情況(圖14)。

嘉思欄炮臺原本就與南灣花園連在一起，它們的綠地是二位一體的關係。

同理，關閘附近原本也是有綠地的。由圖15可知，在19世紀，關閘附近種植了一些樹木，可能是因為行人較多的緣故，植被不是那麼濃密。顯然關閘綠地相對於炮臺綠地而言，對於城市環境的影響沒有那麼的顯著。



[圖13] 19世紀畫家筆下的西望洋炮臺與東望洋炮臺的綠化 (採自《文化雜誌》，第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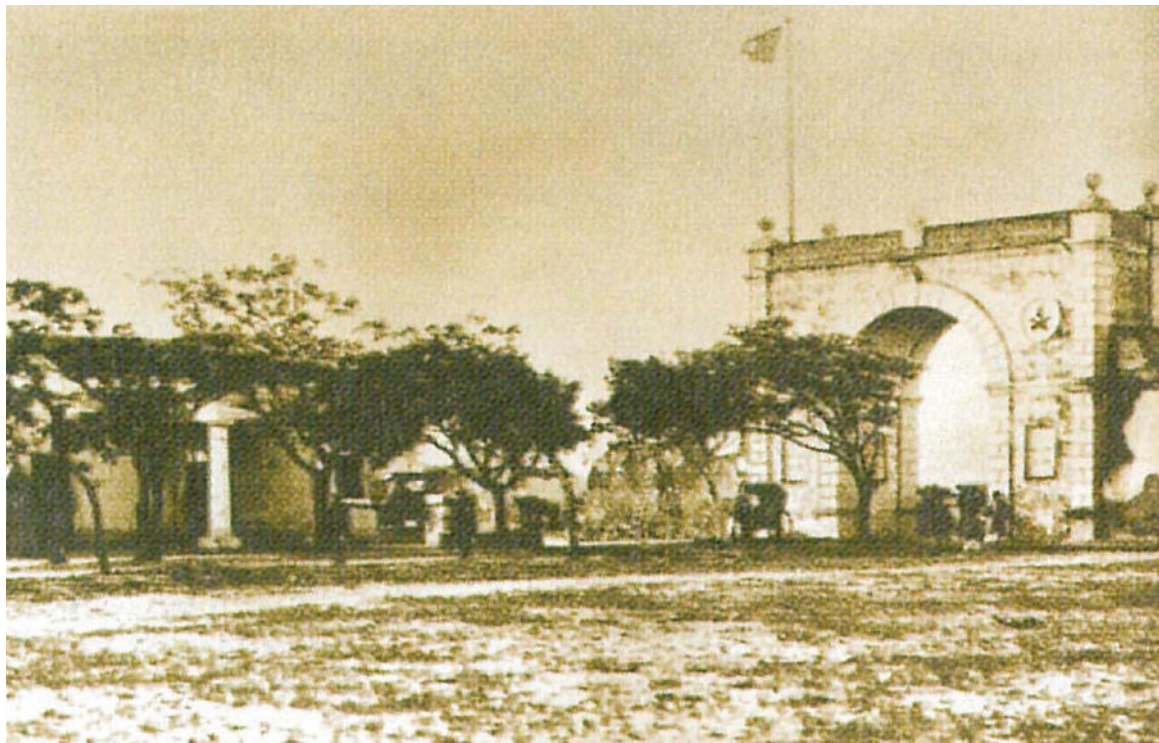
[圖14] 三巴炮臺與城牆的植被(約1905年) (採自《澳門影集：地點、人和生活》，東方基金會，1993年。)

小 結

由澳門早期繪畫、照片可見，19世紀50年代以前的澳門半島，大部分山坡的植被覆蓋率不高，居民區房屋密集而少有樹木。1870年《澳門及帝汶省憲報》也提道：“本市樹木稀少，(……)

有些樹木是賈多素和亞馬留任總督期間種植的，其中有的已經枯死，有的已被砍伐。”⁽⁴³⁾

如[表1]所示，從18世紀50年代開始，澳葡當局對於城市綠化採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綠地類型出現多樣化。隨之而來，這些綠地類型也顯示出若干特點：



[圖15] 關閘(約1890年) (採自林發欽《澳門街道的故事》，澳門培道中學歷史學會，2005年。)

一、私宅花園綠地面積越來越小

1870年《澳門及帝汶省憲報》已經提到，當時大部分綠地分佈在一些私人住宅周圍。這些花園佔地面積都比較大，如盧園、唐園、兵頭花園等，都在數十畝以上。民國時，中小型私宅花園逐漸減少。到二戰時期，大型花園也隨着豪門第宅的沒落而殘破不堪，祇有少數最終被收歸公有，開闢為公園。這個演變過程正如埃斯塔希奧

所說：“澳門這塊彈丸之地，人口密度很大，這一特點不容許廣大市民擁有很大的住宅區，所以民房都比較小。在這種情況下，市民、特別是華人社群的人們都愛去公園休憩。因此，公園盡可能具有一些能夠刺激人們光臨的條件，在日落後能夠盡可能延長開放時間和改善照明設施，不斷加強治安措施也就至關重要了。”⁽⁴⁴⁾

[表1] 19世紀中後期澳門主要綠化行動

時 間	總 督	綠 化 成 就
1851年	賈多素	植樹(數目不詳)。
19世紀60年代初	亞馬喇	修建南灣花園。
1877-1879年	施利華	種了200棵塔樹。
1881-1883年	賈沙拉	在城市內和二龍喉一帶栽種500多株樹木；在沙欄仔種柳樹；從葡萄牙運來松籽種在山丘；在二龍喉、氹仔和路環建立苗圃。
1883-1886年	羅沙	對山丘進行綠化覆蓋；街道兩旁植樹；在花園栽植許多奇異的觀賞植物。
1887-1893年	高若瑟、迪施華、布渣	共種植了16,000棵樹。

二、公共花園綠地從低處往高處遷移

早期公園多分佈在較為低平的地區，如得勝花園、華士古達伽馬公園、南灣花園、南環花園等，進入民國時代，這些花園不同程度地被街道、公共建築及住宅擠佔，逐漸萎縮甚至消失。但另一方面，原本較為高峻的山地如東望洋山、西望洋山、沙梨頭（即白鴿巢山）卻被開發為新的大型人工綠地，而且還出現多功能開發。對白鴿巢公園，當時就有人建議：“這裡可以建造一個湖，因為從水井裡可由水泵將水抽出，然後組成噴泉。空地還可以飼養一些珍貴動物，成為人們喜愛的動物園，而用各種植物又可以在此建成上面說過的苗圃，為殖民地的植物研究提供好條件，此舉肯定既實用又有指導意義。”

三、不同類型的綠地有不同的樹種

民國詩人汪兆銘曾說：“葡人善種樹，夾道行列無不密蔭交柯。”但實際上大多數街道並無行道樹，祇是在一些較為寬闊的大馬路上才有，瀕海大馬路則祇在靠海一側栽種。究其原因，當與多數街道較為狹窄，僅能供行人車輛通行，無空隙地可種樹之故。即使可種行道樹，在樹種的選擇上也有講究。如南灣、西灣等瀕海馬路上喜種榕樹，蓋因其樹冠較寬大，可以遮蔽整條馬路，而且發達的根系可以牢固海堤之故。而較窄馬路則不宜種榕樹，而改種樹幹較直、樹冠較小的棕櫚、無花果（*Ficus carica*. 桑科）、合歡樹（*Albizzia julibrissn*. 豆科）、柳樹等。

其實這種思路早就有人提出：“在市內綠化方面，應選擇那些生長快、枝葉茂盛根深的樹種，但其根部不得過分橫向伸展，以免影響城市建築物的地基。在園林方面，可以不考慮最後的那個條件，但為了滿足不同種類及美觀的要求，應選擇那些外來的樹冠龐大，品種各異的樹木。各種金合歡樹木是符合綠化要求的道路兩旁的樹木。”⁽⁴⁵⁾因此在面積較大的公園，種植的樹種就比較多樣，如在白鴿巢公園，不僅植有菠蘿蜜、鳳凰樹等主導樹種，而且還植有榕樹、棕櫚、竹等。東望洋山是澳門最高的山地，“山上缺少抵禦颱風襲擊的樹種，因而在

山頂上栽種了能提高在貧瘠土壤裡生長的松樹類及其它樹脂類樹木；而山坡上則由無花果樹等覆蓋；在可耕層較深的地區，種植大片的桑樹好處很大，桑葉能飼養一種能產出昂貴工業原料的蠶蟲。”⁽⁴⁶⁾此外，還有柏樹、油桐（*Vernicia fordii*. 大戟科）、臭椿（*Ailanthus altissima*. 苦木科）、枳樹（*Poncirus trifoliata*. 芸香科）、月桂（*Laurus nobilis*. 樟科）、蒲桃（*Syzygium jambos*. 桃金娘科）、刺桐（*Erythrina indica*. 豆科）、假白欖（*Phyllanthus emblica*. 大戟科）、椰樹、咖啡等。⁽⁴⁷⁾這是因地制宜實行垂直分類種植的典型事例。

四、不同類型的綠地有不同的管理方式

公園是澳葡當局投資最大的綠地，因而對其管理尤為重視。1871年11月21日，澳門市政條例法典出臺了有關公園管理的規定：“禁止摘採公園裡的花朵及其他任何植物，否則罰款1元。”

“禁止乞丐、衣衫襤褸者、醉漢或任何損害公共道德者進入公園，否則罰款2元。”⁽⁴⁸⁾1883年2月15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又載：“去年在城市區和二龍喉一帶種了500多株各種樹木，其中大部分已經成活。每年種更多樹木遇到重重困難，因為旱季適於植樹，而在雨季到來之前必須天天澆水。在西洋墳場旁邊的塔石山、仁伯爵所在的若憲山上以及二龍喉後邊的山上插種松籽種樹的工作白白浪費了錢財，因為這些山上都有華人的墳場，而他們認為松樹的根會打攪他們已逝的先人的安定，於是千方百計破壞埋下的種籽，即使有幾棵長出來，如果不被華人拔掉，也會被牲畜破壞。如果不採取嚴厲措施，在澳門植樹很難成活。最好的辦法是命令員警和市政人員阻止破壞樹木的行為。在人們不常到的地方，不僅樹幹被盜，就連支撐杆也頻頻失掉，在樹木生長初期，必須有支撐杆保護才不至於被大風吹倒。”

顯然，公園綠化的管理是較為困難的。而在街道綠化的管理方面要容易得多，主要工作祇在於如何對付自然災害的破壞，譬如在遭受了強烈的颱風之後，祇需要“立即檢查樹苗傷害狀況，並把那些被刮倒的樹苗扶立起來”。⁽⁴⁹⁾



【註】

- (1) [葡] 科斯塔：〈澳門建築史〉，澳門《文化雜誌》第35期，1998年，頁11。
- (2) [葡] 埃斯塔希奧：〈澳門綠化區的發展及其重要性以及本澳植物的來源〉，澳門《文化雜誌》第36-37期，頁106。
- (3) 汪兆鏞：〈澳門雜詩〉：“竹石清幽曲徑通，名園不數小玲瓏。荷花風露梅花雪，淺醉時來一倚筇。”鮑少游〈澳門盧氏別墅寫生〉：“板橋楊柳綠，水樹茭菱多。青竹蔭紅蓼，朱欄映碧荷。”（章文欽：《澳門詩詞箋註·民國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頁59、頁426）
- (4) 吳志良等：《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913。
- (5) 王紹周主編：《中國民族建築》第一卷，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年，頁554。
- (6) 汪兆鏞：〈題張仲球明經〈因樹園圖〉〉，《澳門詩詞箋註·民國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頁124。
- (7)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173。
- (8) 李鵬翥：《澳門古今》，香港，三聯書店，1986年，頁60。
- (9) 郭聲波等：〈近代澳門華人華商地名研究〉，《盧九家族與華人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2010年，頁284。
- (10) [葡] 埃斯塔希奧：〈澳門綠化區的發展及其重要性以及本澳植物的來源〉，澳門《文化雜誌》，第36-37期，1998年，頁107。
- (11) 徐新：〈初析近代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魏源的一首詩〈澳門花園聽夷女琴歌〉〉，澳門《文化雜誌》第5期，1988年，頁51。
- (12) 丘逢甲：〈澳門雜詩〉，《澳門詩詞箋註·晚清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頁224。
- (13) 王寅城等：《澳門風物》，珠海出版社，1998年，頁272。
- (14) [葡] 埃斯塔希奧：〈澳門綠化區的發展及其重要性以及本澳植物的來源〉，澳門《文化雜誌》，第36-37期，1998年，頁106。
- (15) 馮秋雪1925年所作〈南灣步月〉詞可證為榕樹：“綠榕灣畔，愛清宵、三五徜徉。”（《澳門詩詞箋註·民國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頁277）。
- (16) 1883年2月15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也有人認為鳳凰樹是清末移植（唐思：《澳門風物志（續篇）》，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頁417）。
- (17) 吳志良等：《澳門編年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075。
- (18) 汪兆鏞：〈乙丑重九日偕吳澹齋、梁小山、金滋馬交石登高〉，《澳門詩詞箋註·民國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頁94。
- (19) 布衣：《澳門掌故》，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7年，頁41。
- (20) [葡] 科斯塔：〈澳門建築史〉，澳門《文化雜誌》，第35期，1998年，頁11。
- (21) 唐思：《澳門風物志》，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年，頁9。
- (22) 唐見龍：〈遊普濟禪院〉：“十里松濤驚午夢，數聲山磬證禪心。”章文欽考證曰：“東望洋山一名松山，近普濟禪院，松濤蓋來自此山。”（《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頁294）又見劉君卉：〈松山〉：“長松萬影一筇枝，貼地春光與步移。”（《澳門詩詞箋註·民國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頁366）
- (23) 1885年6月20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
- (24) [葡] 施白蒂著，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基金會1998年，頁209。
- (25) [葡] 埃斯塔希奧：〈澳門綠化區的發展及其重要性以及本澳植物的來源〉，澳門《文化雜誌》，第36-37期，1998年，頁107。
- (26) 澳門市政廳：《澳門市街道及其它地方名冊》，1993年，頁311。
- (27) 《澳門及帝汶省憲報》1883年2月15日。
- (28) 梁彥明：〈西灣夜遊偕雪社諸同志〉、趙連城〈西灣遇雨〉，《澳門詩詞箋註·民國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頁325、343。
- (29) [葡] 阿豐索：〈澳門的綠色革命（19世紀80年代）〉，澳門《文化雜誌》，第36、37期，1998年，第125頁附圖，葡文柚寫作“Laranja Melância”，意譯為半橙。
- (30) 《澳門及帝汶省憲報》1883年3月30日。
- (31) 《澳門及帝汶省憲報》1885年4月20日。
- (32) [葡] 文德泉：〈阿爾諾索眼中的澳門〉，澳門《文化雜誌》，第7-8期，1989年，頁71。
- (33) 1886年2月1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
- (34) 湯開建等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31。
- (35) (36) 唐思：《澳門風物志》，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年，頁109；頁112。
- (37) [葡] 阿豐索：〈澳門的綠色革命（19世紀80年代）〉，澳門《文化雜誌》，第36-37期，1998年，頁122。
- (38) 章文欽：《澳門詩詞箋註·晚清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頁7、8、33、73。
- (39) (40) (41) 章文欽：《澳門詩詞箋註·民國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頁404、頁473；頁302；頁479。
- (42) (43) [葡] 阿豐索：〈澳門的綠色革命（19世紀80年代）〉，澳門《文化雜誌》，第36-37期，1998年，頁122。
- (44) [葡] 埃斯塔希奧：〈澳門綠化區的發展及其重要性以及本澳植物的來源〉，澳門《文化雜誌》，第36-37期，1998年，頁107。
- (45) (46) [葡] 阿豐索：〈澳門的綠色革命（19世紀80年代）〉，澳門《文化雜誌》，第36、37期，1998年，頁125。
- (47) 《澳門及帝汶省憲報》1885年6月20日、1887年11月3日。植物學名系筆者所加。
- (48) (49) [葡] 阿豐索：〈澳門的綠色革命（19世紀80年代）〉，澳門《文化雜誌》，第36、37期，1998年，頁132。